

“开化纸”考辨

王传龙

内容提要:开化纸作为一种特殊的刻书用纸,在中国印刷史、文献史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被誉为“清代书籍刻印的楷模”。一般认为开化纸明末开始出现,又可写作开花纸、桃花纸;或以为开化纸为清代内府刻书主要用纸,或因产于开化县而得名,类似的结论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然而,经笔者研究发现,开化纸并非创始自明清之际,而是一种在明代宫廷中就已经大量使用的公文用纸;清代殿本所用之纸既非开化县所产,也与明代的开化纸并非同一物,近人称其为“开化纸”是因讹致误。

关键词:开化纸 殿本 开化榜纸 开花纸 桃花纸

开化纸作为一种宫廷刻书用纸,在中国印刷史、文献史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今天不少学者都将它视为清代殿本用纸中最高档的一种。黄永年称:“这些武英殿本讲究的都用开化纸印,有的也用开化榜纸。”^①魏隐儒也主张:“武英殿和扬州诗局所刻各书……有些书是用细薄洁白而有韧性的开化纸精印,是清代书籍刻印的楷模。”^②国内历年出版的古典文献学史一类的书籍,多对开化纸有着针对性的介绍文字^③,近几十年来开化纸本的古籍竞拍价格也在拍卖行内一路走高。然而,如此著名的一种纸张,它身上却围绕着种种疑团,迄今挥之不去:为何清宫内府档案从不见开化纸之名?开化纸的产地真的是浙江省开化县么?开化纸为何在乾隆朝之后突然不再出现在宫廷用纸之中?它的真实名字到底应该是开化纸,还是开花纸、桃花纸?凡此种种,似乎都显示当今文献学界对于开化纸仍缺少足够清晰的认识。笔者目验开化纸刊本若干种,又遍索各类文献,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辨。笔者学力有限,尚祈各位方家予以斧正。

①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②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③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第60页。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483页。

一、开花纸、桃花纸的得名

开化纸之所以声名大噪,与几位藏书名家的吹捧关系匪浅,其中最有力者当属陶湘。陶湘称:“殿版书以开化纸印本为尤精美,予平生酷嗜之。吾友吴君眉孙尝戏余曰:‘周鼎商彝,世多赝造,若开化纸,自乾隆以后不复制,而其技亦亡。后有巧工,无能为役,藏书家宜永宝之。’此虽谐言,中有至理。”^①陶湘穷数十年之力搜求开化纸殿本,以致获得了“陶开化”的绰号,这当然是在肯定开化纸具有独特价值之后的举动。

遗憾的是,陶湘只重收藏,并未对开化纸进行专门的研究。最早对这一纸类有相当程度研究的人当属周叔弢,他在清康熙顾氏秀野草堂写刻本《温飞卿诗集笺注》后曾写过一篇跋语,对开化纸进行了论述:

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时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辨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一九八二年八月,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②

这篇跋语虽短,却涉及到开化纸的得名由来、产地、盛行朝代、纸类特征等关键要素,无怪乎黄裳称周叔弢“又注意到清刻书所用的开化纸,这也是近代藏书家(如陶湘)所爱好而无人做深入探讨的。他的《温飞卿诗集笺注》跋,可看作最简净的开化纸源流考”^③。周叔弢称“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可见他实际上也不能确定开化纸的得名理由。

黄永年称:“(开化纸)也有人把它写成开花纸、桃花纸,不知究竟哪种写法正确。”^④开化纸与开花纸音近易淆,而与桃花纸则颇有差别,不可不辨。按,桃花纸在古代典籍之中确有其名,但它属于另外一种比开化纸历史更悠久、样式也完全不同的纸张。唐徐坚《初学记》“藤角桃花”条下载:“范宁教曰:‘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⑤《桓玄伪事》曰:“诏命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⑥范宁与桓玄时代相近,皆为东晋时人,可知当时

①陶湘:《清代殿本书始末记》,《陶辑书目》,民国二十五年(1936)武进陶氏铅印本,第4-5页。

②转引自李国庆:《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第232页。

③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72页。

④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145页。

⑤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517页。

所制桃花纸“青赤缥绿”，类似桃花，而且极可能为藤纸。此后桃花纸一直颇为流行，深受朝野权贵喜爱。署名后唐冯贽《云仙杂记》引《凤池编》云：“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①杨炎为唐中期大臣，距离《初学记》编撰年代相去未远，可知“桃花纸”之名一直为当时人所沿用。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叙事》：“桓元（避宋讳，即桓玄）诏平淮作桃花笺纸，缥绿青赤者，盖今蜀笺之制也。”^②从苏易简的说法可以看出，他已对桃花纸的形制不甚了解，而推测即“蜀笺之制”。蜀笺种类繁多，尤以薛涛所创制十色诗笺最为著名，色彩上确与此前的桃花纸有相似之处。但无论如何，桃花纸与明、清两代的开化纸并非一物。开化纸并非藤纸，也无“青赤缥绿”的颜色，称之为“桃花纸”当为辗转讹传。盖桓玄所制桃花纸宋代时已不经见，而后世诗词中仍多取其典以供吟咏，或因此遂与开化纸渐混为一谈。

开化纸、开花纸、桃花纸三种异名的由来，或许还有别的可能。笔者经目验手触，确认周叔弢所言不虚，殿本开化纸确有厚薄两种：薄者今多称开化纸，其簾纹多不清晰，逆光下方隐约可见，簾纹宽度约半指（如清殿本《钦定全唐文》），甚至有逆光亦不能见簾纹者（如清丁咏淇校本《徂徕石先生全集》）。厚者今多称开化榜纸，质地硬而有韧性，逆光可见簾纹（如清康熙殿本《御纂性理精义》、《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但无论是开化纸或是开化榜纸，天头地角皆易风化，风化后多均匀变黄，如遭烘烤。纸张内侧版面处，则易生出浅黄褐色斑点，斑驳错落如桃花怒放，别有一番古朴风貌。此种现象，开化榜纸要较开化纸更为常见，笔者所见开化榜纸刊本十有六七已出现斑点，轻者约三五处，零散点缀；严重者覆盖满纸，细密如麻。笔者推测，开化纸别名“开花纸”、“桃花纸”，也可能是因此类状如桃花盛开的浅黄褐色斑点而得名。过去曾有学人称开化纸上“常有一星半点微黄的晕点如桃红”^③，实则其所见是保护较好、刚开始生斑点的时间段。如果没有经过人为的刻意保护，这一星半点微黄的晕点将迅速蔓延成片，如北京大学古籍馆所藏《御纂性理精义》、《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就已出现类似状况。

二、开化纸的使用情况

根据陶湘、周叔弢等人的叙述，开化纸盛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武英殿刊刻用纸，专用于颁赐王公大臣，此后几于绝迹。开化纸的这一流通始末，与现存刊本用纸的现实状况相符合，已被当今大多数学者所公认。民国时《浙江特别之物产》一文，在“开化名纸”一条下宣称：“开化属衢州府，产纸最佳……若洋纸之纯白也。乾隆以前发帑制造，所印殿版书籍均以开化纸者为更佳

①冯贽：《云仙杂记》卷二，《四部丛刊续编》子部第35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②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三，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③秦杰：《纸中也有“黄金卷”》，《江南时报》2009年5月17日第15版。

……惜新者无从购求。”^①类似的说法流传很广,但与事实相去甚远。笔者研究发现,开化纸实际上并非产自明清之际,而殿本所用之开化纸也非开化县所产。

周叔弢跋语中称“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今考《大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每岁印造茶盐引由、契本、盐粮勘合等项,合用纸札,著令有司抄解其合用之数,如库缺少,定夺奏闻。行移各司府州,照依上年纸数抄造解纳。如遇起解到部,随即辨验,堪中如法,差人进赴乙字库收贮听用。”^②根据后附的“产纸地方分派造解额数”,可知陕西、湖广、山西、山东、福建、北平、浙江、江西、河南、直隶等地,各承担四万到三十八万张不等,又称“凡各处进到纸札,宣德七年令不依原式及水湿不堪者,本部行移本处抄来陪补原数。九年,以福建进到纸札不合原式,及粗薄不堪,令按察司治提调官罪……凡白榜纸,高四尺四寸,阔四尺,十年一次,题派各省办送一百二十万张,贮乙字库。或遇缺乏,召买随行龙沥纸代纳”^③。由此可知,明初江西贡白榜纸之事虽然属实,但白榜纸并非江西独有,而是朝廷规定了法式,由各产纸省共同生产纳交。凡所交纳纸张式样不合者,相关官员甚至会因此获罪。从数量上看,江西所供数量为二十万张,尚排在直隶(三十八万张)、浙江(二十五万张)之后,亦无殊胜之处。此白榜纸为明初朝廷通用纸张,需求量巨大,当非清代殿本所用之开化榜纸。据《大明会典》所载,明初宫廷用纸除白榜纸外,还有随行龙沥纸、草纸等名目,未见周叔弢所谓“小开化”之名。周叔弢的跋语中还提到陆容《菽园杂记》记载了“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的造纸技术,但查考陆容原文,亦未提到开化纸之名。况且明代开化县归衢州府所辖,衢州府隶属于浙江,而非江西。周氏将明初江西官局造纸与浙江之常山、开化县造纸关联起来,颇觉失当。

明初朝廷规定,各省办送的白榜纸统一贮于乙字库,若遇白榜纸缺乏,可召买随行龙沥纸代纳。之后朝廷御用的纸张名目逐渐增多,开化纸随之出现:“细查历年楮供御用,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毁不可考,四十五年取各样纸二百三十五万,内白榜纸一十五万……白开化纸两万,小样白开化纸四万……(隆庆)六年取用各样纸九百万,内白榜纸三百万,白大开化纸三百万……万历六年取用各样纸一百九十六万,内白榜纸一十万……大样白开化纸五万,小样白开化纸一十万……(万历)十四年取用各样纸一百九十六万,内白榜纸一十万……大样白开化纸五万,小样白开化纸一十万……(万历)十八年取用各色样纸一百九十六万,内白榜纸一十万……大样白开化纸五万,小样白开化纸一十

①《农工杂志》1909年第6期,第56页。

②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五工部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③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五工部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343-344页。

万……(万历)二十二年取用各色样纸一百九十六万,内白榜纸一十万……大样白开化纸五万,小样白开化纸一十万。”^①可见最迟到明代嘉靖时,开化纸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御用纸张。嘉靖朝取用开化纸的数量尚不算多,自隆庆朝开始数量猛增,万历之后渐趋稳定。另据万历时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乙字库年例龙沥等纸(辛巳、甲申、己丑约三五年不等)”,工部共召买大白龙沥纸四百万张、小白中夹纸四百万张、大黄龙沥纸一百五十万张、大红龙沥纸五十万张、大绿龙沥纸五十万张、大皂龙沥纸五十万张、高头白纸三百万张、小开化纸两百万张^②。可见此时开化纸的地位非但已经稳定,而且逐渐供不应求,已需要朝廷下令召买。

开化纸之名,则可追溯至更早。明代弘治时倪岳《青溪漫稿》中,已出现了“开化纸”、“白棉纸”的名目^③,或为典籍中所见之最早用例。而最早的开化纸刊本实物,盖出自明末清初毛氏的汲古阁。黄永年称:“极少数初印的汲古阁本中有用开花纸印的。这是一种洁白细腻的高质量纸张,明末开始出现。”^④今所见存版本实物,有崇祯二年汲古阁刊行开化纸本《毛诗注疏》,书末牌记“皇明崇祯改元岁在屠维大荒落古虞毛氏鏊”,可与黄永年之语相佐证。然黄永年称开化纸“明末开始出现”,略觉欠妥。由笔者上述论据可知,开化纸在明代中期以前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以隆庆六年为例,白大开化纸取用量为三百万张,不可谓不多。不过其时开化纸均为朝廷公文用纸,极少用于印刷书籍。明末汲古阁刊本风行一时,毛氏以开化纸为高档刊本用纸,与普通刊本用纸加以区别,其风流衍所及,遂盛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下简称“清三代”)。今所见清三代殿本书,同一种书往往用不同的纸进行刷印,以区别其名贵档次,盖溯源于此。而陶湘、周叔弢、黄永年所称清三代殿本之“开化纸”,与明代开化纸并非一物,其名称系因讹致误(详见下文)。

三、开化纸的原产地及得名

旧说清代殿本所用之开化纸为浙江开化县所产,实为望文生义之词。据雍正七年《开化县志》,其时开化县需向朝廷每岁缴纳盛京历日黄榜纸二百五十张、书籍纸四百九十九张、白榜纸三千二百二十五张,并无开化纸之名。而即使这三类纸张,开化县也无力交付,以致县令上书,请求豁免供纸之役:“额解纸张,屡奉宪檄查催,苟可征求,职敢不竭力措办,勉效急公之义?但熟揣地方事

①[万历]《江西省大志》,《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第一辑,线装书局,2003年,第466-468页。

②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6页。

③倪岳:《青溪漫稿》卷二十四,光绪中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武林往哲遗著·后编》本,叶十。

④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145页。

势,难以往例责之。今日职已计穷能索,不得不为宪台言之者。盖一应纸张者,皆非开产。当前朝盛时,纸价尚平,民力亦裕,价平则额给之银数可以约略相当,民裕则解运之艰烦不至甚为民患。若今日,则价值相去不啻十百,揆之额银止足当十之三四耳……无论纸不可得,即万一有纸,亦仍然束手,终无补于国用。合无详请宪台转行申请,恩赐改折。”^①由开化县令的公文可以明确看出,开化县自明至清,“一应纸张者,皆非开产”。只不过往昔民富纸廉,开化县可以用额银之数从他处转购纸张,以交纳朝廷;雍正时纸价飞腾,原先之额银数已不足购买,所以县令请求改为征求折色银,由朝廷自行从京师等地购买纸张。不仅如此,开化县“六七两年黄白榜纸,前准藩司,因灰薄不堪,上令驳回另造”^②,县令所称“无论纸不可得,即万一有纸,亦仍然束手,终无补于国用”,即谓此而言。雍正时状况已然如此,则若谓清三代殿本用纸皆为开化县所产,自然绝无此理。

那么开化纸的原产地究为哪里?又由何得名的呢?

陆容《菽园杂记》曾提到过“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的造纸技术,其成书时间约在明代弘治朝。虽然陆容并没有提到“开化纸”的名字,但这一时间却与倪岳《青溪漫稿》中最早出现“开化纸”名称的时间大致相符。由此,虽然清代殿本所用之开化纸并非开化县所产,却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开化纸可能因最早诞生在开化县而得名。尽管最迟到明末时,开化县的造纸行业已经荒废,但并不能排除其他地区所生产的相同纸张,继续沿用这一名字的可能性,这也就是周叔弢所做的猜测“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而经笔者研究后发现,这种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开化纸的得名当别有缘由。

《楮槽利弊疏钞》载:“按万历八年工部尚书曾(省吾)题、据江西监察御史邵(陞)疏称:先是隆庆六年奉勘札钦依,江西坐派抄造白榜纸、白大中夹纸、白大开化纸各三百万张……遂据广信府审金槽户,先造式样,并开估计价值……白大开化纸每张高五尺五寸,阔四尺四寸五分,重一两七□□,估价银一分一厘……至万历五年,明旨催办上用纸张事,即将原派未完纸张速委廉干官员如式上紧照数督造,分为三运造解……合无将白榜纸每张定银六厘,白大中夹纸每张定银六厘五毫,白大开化纸每张定银八厘……仍出告示并粘纸张式样于玉山、永丰、铅山产纸县,分张挂晓谕本业造纸之家,造有前样纸张,无论多寡,许其陆续赴官告卖。如果合式,即当堂给银两,两平收买……按属广信府铅山、玉山、永丰三县原系产纸地方,既钦依派造,自应如期速完解进……除将头运三百万张严限勒完,委验如式,仍委传昂于三月初二日起解,又另委奉新县主簿唐士廉沿途僦运去。”^③又,万历时司礼监行造纸名二十八色,其中就

①[雍正]《开化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530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1985年,第440-441页。

②[雍正]《开化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530册,第443页。

③[万历]《江西省大志》,《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第一辑,第470-476页。

有白榜纸、小开化纸、大开化纸、连四纸、广信青纸、铅山奏本纸等名目，五年题造一次；乙字库行造纸名十一色，其中也有大开化纸、大龙沥纸、铅山本纸等名目，造解无期。此等解京御用之纸“原行江、浙、福、湖四省，色数相同，造解顿殊。而彼三省俱各差官资捧现银，前来玉山县收买，每先完解。本省出产，完解反后。”^①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白榜纸、白大开化纸等等，皆由朝廷规定名目式样，下令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四省派造。2. 江西广信府铅山、玉山、永丰三县，在隆庆时均为产纸之处，而且其中就出产开化纸。3. 广信府的供纸数量巨大，头运即达三百万张，比较明初《大明会典》、万历《工部厂库须知》所载之用纸数量，可知广信府实为明代中期朝廷用纸之主力军。4. 浙江、福建、湖广三省所交纳之朝廷用纸，多从广信府玉山县购买。

概言之，明代隆庆之前，江西省广信府生产开化纸，且数量庞大，皆为确定无疑之事。而且广信府的玉山县，最有可能是开化纸的原产地。不仅是因为其他三省都来此地收购，也因为它的造纸业起源要比铅山、永丰更为久远。“广信府纸槽前不可考，国朝自洪武年间创于玉山一县。至嘉靖以来，始有永丰、铅山、上饶三县续告官司，亦各起立槽房”^②。既然开化纸之名在弘治时已经出现，那么源于永丰、铅山、上饶诸县的可能自然可以排除。玉山县造纸业始于洪武年间，且自嘉靖年间（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档案记载“毁不可考”）即一直承造御用纸张，所造之开化纸又大量流入浙江、福建、湖广等省，非常符合原产地的身份。但是，开化纸原产于玉山县，却并不能说明此纸为玉山县所独有，非但广信府后起的铅山等县皆可生产，即便浙江、福建、湖广三省，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收购玉山县的纸张即完成朝廷的派造任务。明代往往由朝廷规定纸的名称、样式，而由各产纸诸省共同生产纳交，像白榜纸就曾有十个不同省份同时生产。各省所产纸质还必须符合朝廷的统一标准，否则就会遭到惩处，如前文列举宣德九年福建省相关官员即因此被罚。可想而知，开化纸也必将面临类似的状况。

那么，开化纸究竟因何而得名呢？若我们留意一下司礼监、工部的行造纸名就会发现，凡某地独产者，如铅山奏本纸、广信青纸，若带地名，则必须要加特定的修饰词，以作更为细致的区分。因铅山、广信产纸类众多，若不加“奏本纸”、“青纸”字样，而径称铅山纸、广信纸，则无从细分。开化县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所产纸类也并不单一，有黄榜纸、书籍纸、白榜纸等各色名目，若开化纸中的开化为地名，则当加其他修饰语，否则只能做一含糊统称，而无从特指某一种纸。纵观明代典籍，皆只云小开化纸、大开化纸，亦可佐证此开化非指地名。笔者推测，开化纸的命名规则当与龙沥纸类似，为一吉利之语。玉山县造纸业始于洪武朝，则无论是大开化、小开化，都可喻示朝廷奉天承运，百姓日趋开化。

①[万历]《江西省大志》，《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第一辑，第464页。

②[万历]《江西省大志》，《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第一辑，第460页。

四、清代内府刻书不用开化纸

笔者查索《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①,清三代档案中均不见开化纸之名。以康熙朝为例:

康熙朝	书名	用纸
四十五年	《清文资治通鉴纲目》、《古文渊鉴》	连四纸、榜纸
四十八年	《佩文韵府》	竹纸
五十一年	《性理大全》	连四纸、薄棉连纸
	《中晚唐诗叩弹集》	连四纸
	《月令广义》、《魏书详注》、《世祖寿诗》	竹纸
	《御选唐诗》	连四纸、竹纸
	《四书》、《书经》、《易经解义》	太史连纸
	《佩文韵府》	连四纸、将乐纸
五十二年	《汉文御制诗》、《满文御制诗》	连四纸
	《御制避暑山庄诗》	西洋纸
五十三年	《大学》一节	连四纸
五十四年	《通率表》	竹纸、将乐纸
	《周易折中》	乐文纸、棉纸
五十六年	《性理精义》、宋版《四书》	罗文纸
	《甘珠尔经》	拾连纸
六十一年	《大数表》、《小数表》	连四纸、太史连纸

上述刷印用纸,皆经康熙皇帝下旨准许或亲自指定。不仅如此,清代《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印刷工价等定例》(以下简称《定例》),对于印刷各色用纸、价格、刷印模式诸项记载极为详尽,但其中也无开化纸之名。《定例》罗列清三代刊行之殿本书目,后注明“以上一百二十六种,进呈连四纸书,六篇合大纸一张;颁发太史连纸书,二篇合大纸一张。五折榜纸随式样用。”^②由此可见,清三代进呈御览之书,用纸多为连四纸,并无开化纸之说。翁连溪在《清代内府刻书概述》一文中称:“康熙一朝档案中未见记载有用开化纸印书,据档案与现存书籍相较,当时的‘连四纸’应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③此说若成立,则明代中期盛行之开化纸,与清三代殿本盛行之“开化纸”,实为两种不同的纸,只不过近人误将清代殿本所用之连四纸呼为“开化纸”而已。同理,近人所谓较

①翁连溪:《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

②《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印刷工价等定例》,《陶辑书目》,民国二十五年(1936)武进陶氏铅印本,第13页。

③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附一》,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厚的“开化榜纸”，实际上也与开化纸毫无关系，应当直接称之为榜纸。

四、小结

开化纸在明代弘治之前就已出现，至明代嘉靖时已演变为朝廷的一种重要公文用纸。明代有不少州县皆可生产这类纸张，并定期向朝廷交纳，其中江西广信府则是它的主要产地之一。开化纸并非因产自浙江衢州府开化县而得名，江西省广信府玉山县更有可能是它真正的原产地。

近人（如陶湘、周叔弢、黄永年等）所谓清三代殿本之“开化纸”，极可能是一种讹呼，它的真实名称（据内府档案记载）为“连四纸”，而非明人所谓开化纸。然或因此纸日久易生霉点，状如桃花，遂逐渐讹生出“开花纸”、“桃花纸”之名，音近致误，导致与明代之开化纸相混淆，更与东晋时就已出现的“桃花纸”（实则并非一物）相比附。清三代时进呈皇帝之殿本书多以连四纸刷印，藉以彰显尊贵。道光以后国力衰退，而刻书、印书耗费巨大，殿本所用之连四纸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王传龙，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